

失踪八十载重现公众视野
寻访十八年再拾岁月遗珍

方大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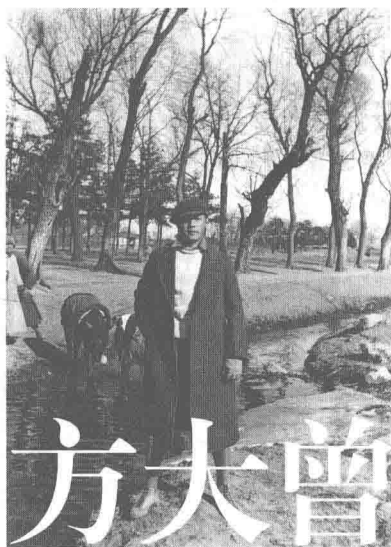
遗落与重拾

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再寻之旅

冯雪松◎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遗落与重拾

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再寻之旅

冯雪松◎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方大曾: 遗落与重拾 / 冯雪松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04-5704-3

I. ①方… II. ①冯… III. ①方大曾 (1912- 约1937)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0879 号

方大曾: 遗落与重拾

作 者: 冯雪松

责任编辑: 乔天碧

装帧设计: 贺玉婷

责任印制: 王宝根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21.75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5104-5704-3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自序

永远在路上

对于新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永远在路上，永远在新闻发生的第一现场，一定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寻找方大曾”是我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最长的一个选题，十八年来，经过不断的深入采访、实地调查和积极推广，失踪了八十年的七七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方大曾，终于进入了当代人的视野，被公众所知晓。它是一次关乎历史追问的行动，也是由媒体人通过影像表达，进行的一次历史补白和责任的书写，对我而言，更是一次家国情怀的洗礼和追问初心的自省。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小方为笔名的方大曾活跃于中国新闻界与摄影界，他是中外新闻学社的重要成员，与范长江、徐盈等人同负盛名。关注民生和时局，他以笔和相机为武器，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第一时间赶赴前线，拍摄并发表了大量来自战地的珍贵照片，鼓舞了士气和斗志。在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中他预言：“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1937年9月18日，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发出了《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文后，杳无音信。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知道了方大曾，此后即展开了漫长的寻找之旅。先期采访，我一个人或火车或汽车或步行，往复行程数千公里，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到蠡县，去史志办、博物馆、报社查询资料，了解情况，曾被当作假记者，也曾被拒之门外。

由于方大曾失踪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岁，尽管他在当

时已经闻名长城内外，但是彗星一般的耀亮和迅失，使他在《中国摄影史》中，不仅没有独立的篇章，而且也没有完整的生平，关于他的描述加起来不足一百字，新闻史中更是难觅其踪。后经不断的艰苦查询和考证，他的生命轮廓逐渐丰满，生活轨迹日益清晰。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生于北京。原名德曾，笔名小方，祖籍无锡。中国战地记者的先驱、杰出的摄影家。

1929年8月，北平市立第一中学读书时，他在《世界画报》上刊登《爱好摄影的小朋友们注意——少年影社征求社员宣言》，发起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1930年考入中法大学经济学系，1932年，任北平《少年先锋》周刊编辑。

1935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工作，不久，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人组建中外新闻学社，任摄影记者。同时，上海的《世界知识》《生活星期刊》聘请他任特约记者，发表了《黄河上的船夫》《冀东伪自治区写真》《平绥路沿线》等图文报道。

1936年转至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他热衷民生，关注时事，陆续发表《缝穷者》（《玫瑰画报》）、《天津海河浮尸之谜》《毒祸》《战氛笼罩下之兴和》《雄视察北的大碉堡》《张家口之现状》（《申报》周刊）、《私货滚滚来》《如此丰台》《战事沉寂中绥边所见》（《良友》画报）、《敌人威胁下的天津》（《国民》周刊）等。

1936年底到1937年初，他用四十三天的旅程，身赴前线，实地踏查，报道了著名的绥远抗战。1937年6月，参加北平摄影学会第一届影展，他的《联合战线》等十五幅作品展出，广受好评。

1937年7月10日晨，他奔赴宛平城，成为七七事变后

第一位抵临现场报道的新闻记者，拍摄了《卢沟桥事件》《保卫卢沟桥之我二十九军战士》《日军炮火下之宛平》等经典照片。《我们为自卫而抗战》《为国捐躯》《抗战图存》等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组照《卢沟桥事变后之北平》等被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刊载。

1937年8月，经范长江举荐，他成为《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负责平汉线的报道，发表了《前线忆北平》《保定以南》《保定以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血战居庸关》等通讯。

作为纪录片工作者，我在长时间的寻找中，通过史料发掘和实地考察，努力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这个年轻人用生活做背景，用生命做胶片，为我们真实记录了当年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如果说，最初的寻找完全是出于对人物的兴趣和探求未知的欲望，过程中，随着了解的深入，不知不觉变成了对于一种高尚精神的认同和追随。

方大曾永远定格在二十五岁，他头戴钢盔的形象，青春帅气，才华横溢，乐观向上，充满正能量。我惊讶于他在战地的高质高产，在艰苦环境中的勇往直前，越是去寻找，就越觉得关于他身上的未知还有很多，他的价值无法估量，这让我难以停下寻找的脚步。

后来，我终于拍摄完成了纪录片《寻找方大曾》（2000年），出版了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2014年）。方汉奇先生评价它们“把湮没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三年来，小方从默默无闻渐渐广为人知，从中国记协组织召开的“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到方大曾纪念室在保定落成，再到“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走进国内外二十多所知名高校，他的名字被纳入权威丛书《中国名记者》（人民出版社）、《中国摄影大师》（中国摄影出版社），更是走进了最新版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他的事迹和经历还被引入教学和考试，并通过各种书展走进了港澳台同胞的视界。我主编的文集《解读方大曾》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使他散落的历程得以重拾，新世界出版社更是积极推动多语种版本的版权输出和译制工作，希望把方大曾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讲到世界去。这一系列行动和影响，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撰文称，从纪录片到图书，从纪念室到公益计划，跨越影视界、出版界、文学界、学术界的“方大曾热”，聚合成为兼具传播力与影响力的现象级话题。

方澄敏保留哥哥遗物的发现和整理，是促成这本《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姊妹篇写作的动因，三年来，新史料的梳理、发掘、实地寻访和对家人的多次深入访问，百余张方大曾私人照片首度发现，同学、师友的散碎回忆浮出水面，使我有机会揭开历史的地表再次聚焦，又一次接近感知方大曾生命的温度。

与他有过生命交集的进步教师王思华、范文澜、阮慕韩，同学少年夏农苔、曹承宪、高云晖，生死线上的金振中，摄影启蒙蒋汉澄，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伴随着寻行的步履一一显现。

这本书是一次再出发，从方家后人提供的遗物、遗照入

手，沿用《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确立的纸上纪录片的表达方式，集合最新研究成果，以史料发掘和实地调查为基础，融用多种视角，呈现寻找过程中的新线索，梳理出了方大曾的师友圈、社交圈及鲜为人知的特殊经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个人世界。

一个新闻人，如果脱离了民众和家国，不用双脚去丈量，不用内心去感知，再炫动的画面也是虚空的，再华美的辞藻也是苍白的。方大曾的双脚始终踩在大地上，无愧为时代变迁的记录者、民众命运的关注者。寻找方大曾的过程，是作为一名新闻人的我，职业理想不断升华的过程。我越发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记录者是严谨和真实的，而不是炫技和讨好的，用实心、动实情、写实迹，才能见实效。

我相信，在媒体融合的今天，这些道理仍然适用，并且更加重要。书写和记录历史，现代技术手段只能是辅助，只有潜心求证、努力追问，借助现代手段进行立体表达，才能更好地与时代同频共振，提升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

记得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寻找方大曾》专辑拍摄现场，倪萍大姐问我，十几年，从一部纪录片到一本书，是不是意味着这件事的终结？我说，只要方大曾没有下落，他就是我永远的选题！

永远在路上，作为一名新闻人，生命不息，行走不止，小方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在路上，希望《方大曾：遗落与重拾》与你同行！

（原标题：《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刊载于《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3日12版，有改动）

目录

- 一 方澄敏的遗物 / 001
- 二 少年小方的成长 / 029
- 三 大学时光 / 063
- 四 光明行 / 095
- 五 在天津 / 125
- 六 行走的记录者 / 155
- 七 绥远之远 / 193
- 八 保定南北 / 233
- 九 故事里的故事 / 275
- 十 岁月拾遗 / 303
- 后记 找到自己 / 331
- 方大曾生平及研究年表 / 333



一 方澄敏的遗物

我到北京图书馆、档案馆都去找过材料，他的好多照片都没有标题，所以也不好找，我那时候天天去，借杂志看，也没找到什么。后来又去北京图书馆报库，在西黄城根，从单位开了张介绍信，我在那儿查了一个月资料，每天半天时间，找到不少，《大公报》什么的。查到1937年9月30日的《大公报》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这跟全民通信社说的情况吻合，后来就没有小方的音信了。

——方澄敏的回忆

开始写作《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的时候，是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航班失联的第十八天，记得那一段日子里，我一边专注于书写，一边关注着神秘失踪的飞机给世界带来的种种困惑，专注加关注的心境伴随了成书的全过程。

如今，两三年的时间过去了，马来西亚官方表示，截至目前，共有 22 块疑似 MH370 航班的外侧襟翼残片在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地陆续发现，但客机的确切踪迹迄今尚未找到。除了对于机长沙阿（Shah）动机不良的揣测外，种种丰富的想象力，把舆论引导得如同蝴蝶乱飞。有意思的是，美国女记者内格罗尼（Christine Negroni）日前推出新书《空难侦探》（The Crash Detectives，暂译），为客机失踪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说法，她推测，沙阿去洗手间的时候，由副机师操控飞机，他向越南胡志明市的控制塔发出“晚安”的呼号后，机舱便发生“爆炸性失压”，霎时间，机内大量空气迅速外泄，使得沙阿因缺氧未能返回驾驶室，副驾驶因缺氧而神志不清，双手抽搐，最后客机无人控制，在自动飞行模式下偏离航道，飞向浩瀚的印度洋。

当然，在结果没有水落石出之前，谁又能说这些推测没有道理呢？世界上不知道还有多少谜面未解，留待未来作答。我期待着有一天，当谜底一一破解时，方大曾的消失之谜也能够随之揭晓，给数十年来等待和寻找他的人们一个抚慰内心的答案。应该相信，有一个问题就会有一个答案，如同有因即有果，迟早而已。

2015 年 3 月底，《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近半年后，我再次前往保定，去参加该市方志馆的落成仪式，也再次见到了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拍摄完成以来，十五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孙进柱。感谢岁月，它虽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没有带走我们的友情，已经是保定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进柱兄，在和我叙



冯雪松（中）与方大曾亲属在方大曾纪念室合影

述彼此分别后的变化时，仍不时地提到我们当年一同寻找过的小方。忘不了1999到2000年的两年间，为了节目的拍摄，我曾多次往返北京与保定之间，有时候和摄制组同行，有时候一个人独往，找知情人、查资料、实地寻访，他总是抽时间陪着，渴了一瓶矿泉水，饿了一人俩火烧，我们的友谊就是在寻找路上建立的。进柱兄撰写方志三十年，冷板凳坐了半辈子，这一次能把受人冷落的方志馆，开到光园——曹锟当年的大帅府，他除了高兴还是高兴。

在落成仪式后，我和时任保定市长的马誉峰谈起了筹备方大曾纪念室的想法，当听说小方在蠡县发出最后一篇报道后失踪了近八十年，至今没有下落时，马市长一边翻着《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边果断表态：“一定给小方在保定‘安’个家，地点就在光园！”

几个月后的7月7日，保定光园，在人们的簇拥下，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查昇年、查松年和亲属走进方大曾纪念室。这是经多方筹措，众人支持的结果。面对舅舅的铜像，后辈们潸然泪下，哽咽无语。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殷陆君



先生、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陈昌凤教授和各界朋友一同见证了小方“安家”保定的历史时刻。

光园位于保定市区裕华路中段，原为明代大宁都司右卫署和断事司。清康熙二年直隶巡抚由正定迁到保定后，巡道司狱署驻此。雍正二年（1724年）又改为按察使司狱署。1916年，曹锟任直隶督军时，在此大兴土木，进行改建、装饰，成为他的公馆，据传曹锟因敬慕抗倭名将戚继光，故将此处改名光园。光园主厅呈“工”字形，分前后厅，以廊相连，方大曾纪念室就设在这“工”字的最后一横起笔的部分，面积不大，二十几个平方米，由中国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题匾，室内陈设着小方遗留下的旅行箱，展示他的作品、生平和十多年来我们的寻访足迹，纪念室正中安放青年雕塑家李一夫敬制的方大曾铜像。

这似乎是一个故事最好的结局，也应该是长时间寻找方大曾的圆满句号，然而不久后，查昇年先生的一个电话，让句号再次打开，使小方的故事又一次继续下去。

除了表示家人的感激，电话里，查先生向我讲述，舅舅失踪之后，亲人们苦盼多年没有消息，母亲方澄敏曾找过哥哥最后供职的《大公报》，报社连着登了三天寻人启事，仍是没有结果，又辗转找到全民通讯社问询，也不知其踪。数年过去，母亲和姨妈方淑敏就让孩子们改口，管外婆方朱理叫奶奶，这个决定，意味着姐妹俩预感小方不会再回到这个家了。查先生还告诉我，母亲2006年去世后，有一些私人物品一直没有动，希望我有空去看看，或许对研究方大曾有用处。

方澄敏九十一岁辞世，没有让后人留下骨灰，遵照她的意思，撒了。她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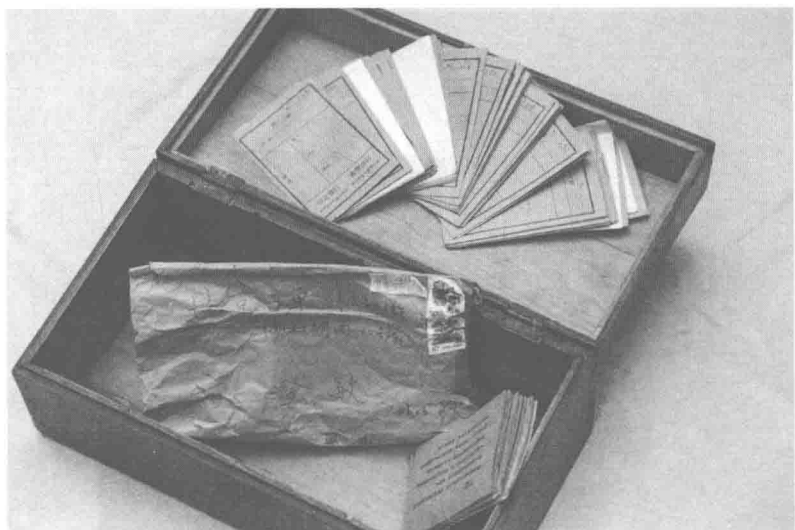


整理方澄敏的遗物（孙楠摄）

我们再也不清楚，世上还有谁曾经见过方大曾？除了日常所用，她的遗物是一大一小两只箱子，大的是小方使用过的旅行皮箱，小的木箱则是小方用七块大洋找人定制的两个底片盒之一。我原以为，2006年3月16日，随着837张底片一同捐献给国家博物馆的那只是唯一存世的，没想到另一只还在。

是时光的雕刻，旅行箱斑驳的皮面划痕累累，左一横右一竖，不知道这些经年累月的密码记录着什么，预示着什么。八十年前，时间的那一头，它曾伴少年出远游，行程千里问苍生；八十年后，时间的这一边，它静待来者解迷雾，风尘百载叹无声。打开来，一些有关方大曾的杂志和书在里面仔细排放着，还有方澄敏的记录本、照片、资料、手稿和私人信件，若有若无的樟脑味道告诉我，此刻正在轻轻地接近一段家族的历史，可以触碰，可以感知，还可以慢慢唤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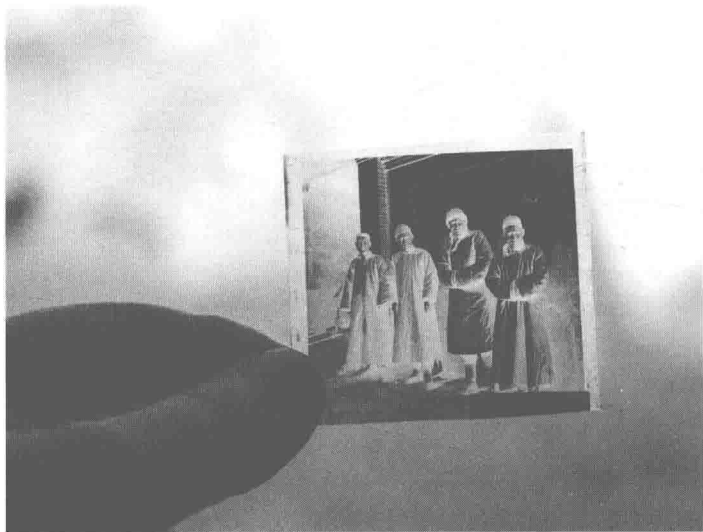
小木箱里，一个旧信封外勒着几道发白了的皮筋，里边包裹着数十枚粉



方澄敏珍藏的哥哥的底片盒(冯雪松摄)

红色的底片袋，胶片一张张取出来，对向阳光，竟然是从未见过的小方的私人照片和一些陌生人的影像。十几年前，即使是在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拍摄过程中，我们曾反反复复地见识过方大曾留下的所有底片，此刻，可以确定地说，这一部分是实实在在没有见过的。

为什么方澄敏老人在纪录片摄制时没有拿出这些底片？晚辈们不得而知。它们被精心地保管在隐秘的角落，是因为比较私人化？还是另有隐情？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除了方澄敏的孩子们，我也曾问过方大曾的姐姐方淑敏的女儿张在娥和儿子张在璇，他们也没有听姨妈说过这部分珍藏，难道是因为年深日久被遗忘了吗？应该不会，在她1987年写给张在娥的一封信里，看得出，对于方大曾和协和胡同的老宅这“两件事”，她有着深切惦念与眷恋，怎么会忘记了呢？



小方留下的底片至今颜色未变（冯雪松摄）

在城：

来信知悉，大舅的结论问题是办得晚了，“文化大革命”闹了那么多年，再加上我这“不为名不为利”的老脑筋，所以没有赶早进行，奔走了两年多才才有这几篇文章发表，到现在还无人理睬，死的死了，官大的不以为然，吴群是搞摄影史的，他的角度跟我们的希望不一样，吴群只能写点文章把大舅介绍给今日社会，他也出不了别的力。

大舅的历史比较短，他只活了二十五岁，焉能有很长的历史。我写了一份简介，并有一份全民社的文章是可以证明他是牺牲在华北战场，1938年我在重庆曾找过大公报，报馆给登了三天寻人启事，也就没有下文了，他是中外新闻学社战地记者，也是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在那样动乱的时代，谁能给解决找人的事，就是在后方的人，也还担心着炸弹，自身难保。